



苏联人同 阿拉伯人 关系史话

〔埃及〕穆罕默德·哈·海卡尔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苏联人同阿拉伯人关系史话

穆罕默德·哈·海卡尔著

星 灿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 $\frac{3}{4}$ 印张 170,000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203·002 定价: 0.69元

内 容 简 介

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是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新闻记者，曾任埃及金字塔出版社董事长兼《金字塔报》主编多年。他是已故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知己和顾问，也是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初期的顾问。他曾参加了苏埃领导人之间的大多数会议，参与了纳赛尔时代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一度在政府内任职。

本书是海卡尔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完成的新著。作者根据大量事实，以一个亲身经历整个历史过程的见证人身份，生动地描述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五年二十年间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的起伏变化。作者特别记述了埃及前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与苏联打交道的痛苦经历，并为了完成纳赛尔的遗愿，根据纳赛尔的多次谈话总结出第三世界领导人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教训。作者透彻而诙谐地详述了纳赛尔、萨达特访问莫斯科以及赫鲁晓夫访问埃及的过程，并援引了大量历史文献，如纳赛尔、萨达特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中东问题的来往信件等。作者还记述了在这一阶段国际上和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的一些内幕情况。对了解苏联如何利用中东复杂局势插手中东，妄图控制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系根据科威特《祖国报》的阿文本译出。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一定还有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七九年八月

第 一 章

苏共政治局的会议室在克里姆林宫中央委员会大厦二楼。这是一个长方形房间，两面开窗，正面的窗户俯视一座花园，另一面的窗子下面是一个庭院。房间里的唯一装饰是墙上并排挂着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会议桌上铺着绿色的台布，上面摆着矿泉水、饼干、巧克力糖和香烟。旁边一张较小的桌上整齐地放着书籍和小册子，还有火箭、宇宙飞船和飞机的模型。

同来访的外国代表团的正式讨论也在这个房间里举行。参加会谈的双方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旁一式的咖啡色皮椅上。但是，今天，——一九七七年夏季的一天，这里没有任何外国人。现在坐在桌旁的九个人全是苏联公民，他们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中的一些最强有力的人。

坐在首席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从六月起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他旁边依次坐着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党的意识形态专家米哈伊·苏斯洛夫，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然后是苏联上空两颗青云直上的明星：负责安排向国外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基里尔·马祖罗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后者一手托着头，另一只手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用笔乱划，然后将它撕成碎片。此外，还有苏斯洛夫的两名助手：党中央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和他的一位专门处理同民族解放运动有关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助手尤里亚诺夫斯基。

阿拉法特有多少师？

这些人组成了政治局的常务班子，负责处理一切有关对外政策、国防和安全的事务。今天，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中东问题，他们正在逐个地仔细研究中东国家的情况，他们以一个政府的身份对这些国家表示关注。

通过研究，他们发现情况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埃及，这个曾经同他们有着最悠久、最密切联系的国家，他们武装了它的军队、使之现代化，他们的技术人员参与了作为现代工程奇迹的高坝的建设，但是如今已经轻蔑地抛弃了他们，而它的总统正以最辛辣的语言开始无情地批评他们、抨击他们的全部行动。苏丹，这个共产党一度最得势的国家，对他们的敌视并不亚于埃及。而叙利亚，作为苏联军事和非军事援助的主要受益国之一，依然同他们保持着亲热的关系，然而几乎很难说这种关系是一帆风顺的。伊拉克，曾经愿意而且实际上渴望完全依靠苏联，现在正热衷于搞多样化，换句话说，为了寻求现代化技术，伊拉克正在瞩目西方，并把它的一些最有油水的合同给了西方企业。

显然，期待从沙特阿拉伯方面得到的只能是实际上的敌视。当“安东诺夫式”巨型飞机来回地给也门共和国派军队运送各种武器装备甚至食品的时候，北也门一度看来可能带来福音，但是，现在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名俄国技术人员。在索马里本来也是大有希望的，但是，那儿的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在非洲之角，由于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的沉重包袱，苏联人的好日子到头了。只有巴勒斯坦人一直是比较忠诚的，但是，这些没有祖国的事业的主人，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

斯大林曾提出过一个问题：教皇有多少个师？也许，他的幽灵正在询问克里姆林宫中的他的继承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有多少个师？

无疑，当他们看到这种令人沮丧的情景时，会记得过去同纳赛尔发生意见分歧的许多场面。他们决没有忘记纳赛尔怎样劝告利比亚主席穆阿迈尔·卡扎菲不要从苏联而从西方购买武器，以及后者怎样听从这一忠告，购买了“海市蜃楼式”飞机。尽管他们同另一个反共的阿拉伯国家约旦的关系已有了改善，但是他们不能忘记，是纳赛尔曾规劝侯赛因国王继续从美国购买武器，而不要如他曾打算的那样转向苏联。纳赛尔的理由是，我们不应该允许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变成在超级大国之间搞极化，如果阿拉伯人全部从苏联得到武器，以色列人全部从美国得到武器，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侯赛因又一次听从了纳赛尔的劝告，没有靠拢俄国。

条条大道通向华盛顿

事实上，在一九七七年夏天，已经不容否认，苏联的整个中东政策已是千疮百孔。这一整个地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朋友，更不用说是可以信赖的盟友。多年来，苏联被看作是阿拉伯权利的主要捍卫者，而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条条大道都通向华盛顿。使苏联人倍感痛苦的是，他们懂得，如果此时他们有任何可能性在就中东问题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再度起一种有显著的作用的话，那将仅仅是由于美国人邀请他们这样做，因为美国人认为他们参与作为日内瓦会议主席是有好处的，即使阿拉伯人并不这样看。问题不是单纯的一场在克里姆林宫会议桌旁开会的人应该深思的政治灾难，而且还

必须计算这种失败的经济代价。在过去几年里，柯西金曾经承认，苏联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资已达一百五十多亿美元，在一九七七年这个数字一定已增加到不少于二百亿美元。这笔巨额的支出在政治、军事、甚至经济上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红利？谁还会重新谈起高坝、幼发拉底河水坝或者埃及农村的电气化呢？

环顾四周，苏联领导人能够看到，阿拉伯人要求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由他们扮演武器供应者的角色。实际上，好象阿拉伯世界几乎已经接受基辛格有一次在同我会晤中提出的论点：“俄国人能做的一切就是向你们提供武器，而我们美国人能给你们和平。”

然而，武器供应者的角色与其说是使人感恩戴德，不如说是制造了分歧。这是一种俄国人不能用任何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的作用。他们知道，中国人曾就此奚落他们。周恩来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会见我时曾经问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了呢？它完全成了一个军火商，要你们为所购买的武器支付利息，掠夺你们的产品。”

就这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当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同他的苏联同事安德烈·葛罗米柯会晤时，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击。法赫米满以为自己给葛罗米柯带来了好消息，告诉他，科威特人带着两亿美元现款马上要来莫斯科买武器。葛罗米柯苦涩地说：“部长阁下，难道您真的相信中国人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吗？”

但是，苏联人自己已逐渐开始看到他们是以能够向中东提供或卡住武器的姿态执行其中东政策的。这样，他们通过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特点而滑到了他们曾极其愤怒地拒绝过的武器出口商的角色。当伊斯梅尔·法赫米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

同勃列日涅夫会谈时，他们再一次使他懂得了这一点。当时他提到苏联答应给埃及但埃及没有收到的某些零件和补充的武器问题，他说：“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某些主席阁下能够克服的官僚主义的障碍。”勃列日涅夫望着他说：“这不是由于什么官僚主义的障碍，而是一项政治决定的结果。”伊斯梅尔·法赫米问他：“谁作出了这项决定？”勃列日涅夫说：“是我作出的。你们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内容是，埃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打仗，那你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武器？”

坐在克里姆林宫这张长条桌边的人们面临的情景真是凄凄切切。除了丢脸挨骂之外，他们提供了武器而又不能根据协定得到他们应得的代价，看来苏联领导人没有什么本钱。也许，勃列日涅夫正在要求他的同志们就可以改善局面的途径提出建议。但是，他们能够提供什么安慰呢？他们都焦灼不安。葛罗米柯很清楚，苏联人在中东的失败已经削弱了他同美国就有关缓和与限制武器条约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地位。乌斯季诺夫意识到元帅和将军们要求确保俄国南大门的防御态势的压力。安德罗波夫能够辩解说，每件事情的失败都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策划的一些倒霉的阴谋造成的。可是，即便如此，也只能带来微不足道的安慰。中东已以某种方式证实，它是苏联人冒着危险走在上面的一个布雷区，或者说是在他们手中爆炸的一颗手榴弹。比喻也许不同，但事实就是那样。

希望……然后是受挫和痛苦

我勾划了其轮廓的这个场面并没有确切的历史根据；其中进行的讨论的内容当然纯属猜测，尽管我们猜出这些内容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常务班子的存在是很多人

都知道的，它过去和现在都定期举行会议研究中东的局势，也是尽人皆知的。比如，人们知道，它在萨达特总统于一九七二年夏天驱逐苏联技术人员之后，至少举行了六次正式会议。

如果这个班子所进行的讨论——正如我们必然估计到的——揭示了巨大的痛苦和失败，那并不会使人惊愕。一九七七年夏天苏联人在中东成功的可能性中间存在的矛盾，同二十年前一样，几乎难于置信。当时，埃及达成的一笔交易——有名的捷克军火交易——把苏联吸引到了这个地区。

那时候，正在进行的每件事情看来都对他们有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控制这一地区达一代人之久的两个大国的势力。法国已被打败，英国一蹶不振，濒临破产。苏联经过这场战争，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处于同其唯一的对手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即便没有超过它。当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流行一些新的思想，变革之风四起。那些一直强有力的传统政府，当这次大战一结束，就意识到这种风向，可是它们缺乏适应它的本领或行动、即干任何事情的意志。

在阿拉伯国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同外部世界接触更广泛的领导人。无线电和空中旅行打开了这个世界中过去未能抵达的领域。在这个世界中，原子武器、冷战和联合国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出一个现实：世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已同一九三九年大不相同了。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显然，苏联的革命力量将起到它正在起的作用。

在阿拉伯世界，军队——它们是一些仍然十分落后的社会中唯一现代化的、比较有组织的机构——将产生出新的领导。陆军军官们已在一个又一个阿拉伯国家里掌权：叙利亚、埃及、伊拉克、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和利比亚。他们的动机有时是纯粹的利己主义：为了实力而追求实力；可是，有时候

他们又是带着一项经过长期认真考虑并决心实行的改革计划上台的。

这些壮志凌云的人和理想主义者未能找到一条平坦的道路。这是冷战时代，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峙。然而，拒绝核战争这一点使得每一方都去寻求其它一些手段来继续进行角逐。宣传、心理战、各个情报局、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三世界已成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武装起来的派别之间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争夺的主要场所，这两家的争夺取代了扩张主义的欧洲所进行的殖民主义争夺。

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中，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导人，不管愿意与否，已屈服于一些巨大的压力。西方是他们所熟悉的世界。他们常常是既厌恶西方的政策又欣赏西方的机构。他们懂得开放的民主的意义，他们愿意看到这种民主在他们国家里发扬光大。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人民还不具备实行这种民主的条件。此外，西方曾同被赶下台的那些旧阶级有过公开或私下的结盟关系。就这样，这些新的领导人在起初自动地向西方寻求援助后，发现自己同西方发生了冲突。他们带着痛苦不堪的心情转向东方，转向共产主义世界。

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重重顾虑的。这些新的领导人所受到的影响都来自西方。他们读的书、学的历史、看的电影，都是西方的。他们所熟悉的语言，除了本国语言外，是英语和法语——对他们来说，俄语曾经是，而且一直是深不可测的。对于他们所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切——封闭的社会、压制思想自由、斯大林的恐怖等等，始终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带着疑惧，或者换句话说相信自己的所有谈话都将被秘密记录下来情况下去莫斯科的。后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反应。阿拉伯人决心不陷入正在向他们打开的这个新世界。在他们感到西方在政治自由方面有许多东西值得他们学习的时候，他们感到东方在平等和社会公正方面有可取之处，但是，同时他们想同它保持距离。

同东方和西方的接触

中东或非洲的新的领袖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向苏联客人或东道主致意的讲话开头不用“尽管存在各种信仰上的分歧”这句话的。此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完全知道，在他们的国家里有一个效忠于莫斯科甚于效忠于他们的共产党。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可以向这些民族主义的领袖提供的东西。首先，它们能够使他们在结束西方殖民主义控制这一首要任务上大受其益。其次，他们能够帮助他们中的每个人在经济上发展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的领袖常常发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有不少可资借鉴的东西，但是同时，从与他们自身情况有关的苏联经验中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他们为权力和计划的集中制所吸引，并且发现，苏联国内有些地区其气候、社会条件同他们所打交道的那些地区相似。因此，每个阿拉伯访客几乎都被带到哈萨克斯坦，在那里被告诉说，在这个地方，老百姓曾长期过着同他的国家的人民正在过的完全一样的生活，但是，这里的老百姓已变得无法辨认了。

这样，这些新的领袖们被置于一些真正的吸引力之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毫无价值而拒绝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而东方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从若干方面来看正是他们试图建立的那种社会。东方的吸引力是强大的，实际上，在一段漫长的时间过去之前，这种吸引力已经比他们所

希望的更为强大。

因此，他们希望能同东方进行密切合作，同时保持他们同西方的渠道畅通无阻。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研究两个超级大国迥然不同的处事方式。西方在同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时倾向于相信，它对大多数或所有的回答是心中有数。它紧紧地依靠以往的殖民主义的经验，而在新的条件下，这种经验已不管用了。特别是美国人，他们先入为主地假定，要是他们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警察和情报机构，其余的机构将步它们的后尘。

而俄国人——他们研究了西方的做法，并已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能够对这些做法进行改进——则已认定，他们赖以取得自己所寻求的影响的最好办法是向武装部队提供装备，并鼓励可以产生工业无产阶级的工业化。可是，当俄国人仔细观察同他们相联系的国家，认识到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一个人——只要他活着——的意志和能力的情形时，他们忧心忡忡。

在每个新独立的国家中，他们确实发现是一个人——也许他并不是领导争取独立斗争的那个人——独自作出决定，特别是在对外政策和防务的问题上。也许，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向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过渡的这个阶段，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是，它蕴含着某些风险。

由于俄国人懂得这些事情，他们便经常鼓动这个人建立一个在他之后仍然存在的组织。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象阿卜杜勒·纳赛尔这样的人，可能变成他们国家的君士坦丁，引导自己皈依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的宗教，并通过这个办法为引导他们的全体人民打开道路。这最终不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卡斯特罗在一九五九年元旦上台时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很快就领悟了，并怂恿古巴人民跟他走。那么，为什么阿卜杜勒·纳赛

尔或卡赛姆不能如法炮制呢？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尽管在杜勒斯之流的西方领导人每一次试图用贴共产主义标签的办法孤立纳赛尔的时候，他们的希望曾受到过鼓舞。

苏联人通过一九五五年的武器交易在埃及建立起来的新关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这种关系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俄国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所寻求的进入中东的门户，而且还打开了通向非洲的道路，确定了苏联同世界各地解放运动的关系的模式，以至一九七二年在中东遭到的打击，对他们来说，也势必具有超出当地范围的意义。

当一九七七年夏季来到时，他们已看到一些迹象，表明他们的权威已经江河日下。譬如，一九七六年卡特掌权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鼓励他更多地利用联合国来寻求他的各项国际目标。瓦尔德海姆坚持这一点说：“对联合国用不着担忧，过去苏联人能够控制的第三世界中的多数已不复存在。”苏联领导人知道事情确是如此。他们知道，一度同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许多魅力已经烟消云散。

确实，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有顾虑的。有时候，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但是，甚至在他们这颗明星十分明显地冉冉上升时，苏联人也在寻思阿拉伯人到底有求于他们什么。阿拉伯人是单纯把他们作为对付西方的筹码吗？阿拉伯人在感到紧张局势已经消除时会把他们的苏联新朋友打入冷宫吗？

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之后的几年里所遭到的惨败发生之前，苏联人曾试图分析局势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寻找一切理论根据，力图认为中东处于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和历史的范畴之中。这样，就使他们能继续推行他们那套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际上是有益的政策。

阿拉伯领导人也曾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心情不亚于苏联人

要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知道有多少事情有赖于同这些暧昧的新伙伴保持一种有效的关系，希望这种伙伴关系产生不少于苏联人所希望的成果，并且，如果有办法的话，希望避免发生冲突和争执。

阿卜杜勒·纳赛尔了解他们各种类型的人

没有任何一位阿拉伯领袖同苏联人的关系比阿卜杜勒·纳赛尔更长久或更密切。他在各种情况下见过他们各种类型的人。他是在斯大林和冷战时代上台的，卒于勃列日涅夫和缓和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有过光荣的时刻与悲惨的岁月，出现过战争与和平，欣喜若狂与近乎绝望。他同苏联各级领导人之间保持着一种个人关系，不仅是同克里姆林宫的首脑，而且还同象涅巴鲁基纳、斯堪什科夫、诺维科夫和乌斯季诺夫那样的技术贵族，同马利诺夫斯基、格列奇科、戈尔什科夫、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雅库鲍夫、鲁金科和扎哈罗夫等陆军元帅和海军将领。

由于阿卜杜勒·纳赛尔拥有同俄国人打交道的长期的和各种各样的经验，第三世界的许多领袖在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之前，总要到他这儿来听取他的忠告，除了象苏丹总统尼迈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这样的阿拉伯人外，还有象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刚果（利）总统卢蒙巴和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这样一些刚获得独立的黑非洲国家的元首。他们发现阿卜杜勒·纳赛尔在这方面所讲的话特别有益。以后，当阿卜杜勒·纳赛尔看到他们在同俄国人交往中遇到困难——他们试图在东西方之间、或在他们的人民本身之间、或同邻国政府保持平衡——时，当他有时看到有人走钢丝失败或看到某个领袖遇

到灾难时，他感到，鉴于他是历尽艰难才学到一些东西的——当时只有同铁托和尼赫鲁商量，讨论一些事情——应当通过某种途径向别人提供他的经验。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八日晚上，阿卜杜勒·纳赛尔头一次想到要把他关于如何同苏联人打交道的想法写出来。已经逝去的这些岁月是有历史意义的。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高坝建设的第一期工程，使尼罗河水改道了。这件事把成千上万兴高彩烈的埃及人吸引到阿斯旺，还引来了大批遐邇闻名的外国客人，其中有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阿尔及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但这次活动的明星无疑是苏联总理、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进行访问。高坝竣工典礼把这位俄国领袖吸引到了埃及，这次活动现在变成了阿拉伯—苏联合作的联欢节。高坝是非洲的一项无与伦比的最宏伟的工程。在西方遇挫和失策之后，苏联人弥合了裂痕，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建造了最终将驯服尼罗河水的一座新的金字塔。通过扩大灌溉和提供更多的电力，它将完全改变埃及农民和产业工人的生活。

赫鲁晓夫同阿里夫的争吵！

在阿斯旺举行的庆祝活动使人们疲劳不堪之后，在五月炙人的炎热下，纳赛尔安排了几天让大家轻松一下。所有客人将前往红海之滨的比尔尼斯港，官方的“自由”号游艇已停在码头上，安排了划船和钓鱼节目。

五月十五日上午，当赫鲁晓夫到来时，大部分阿拉伯来宾都已在游艇上，他们上前欢迎他。当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向他伸出手来时，赫鲁晓夫皱了下眉头向后退

缩，大声叫道：“我决不同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人握手！”赫鲁晓夫勃然大怒的秘密是，几天来，巴格达电台广播说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枪毙。阿里夫试图解释，这些人被处决，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但是，赫鲁晓夫的激动情绪并没有平息下来，阿里夫很快就显出失去控制的神情，咕哝着提出抗议。于是，阿卜杜勒·纳赛尔用阿拉伯语说：“阿里夫兄弟，现在不要再说了！”

然而，这已破坏了气氛，人们兴味索然。于是，大家围坐在游艇的椅子上，谈论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宗教，等等。

本·贝拉特别好争论，赫鲁晓夫也是一样。阿卜杜勒·纳赛尔以东道主身份，试图防止辩论出了圈子。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譬如，在某一时刻，阿卜杜勒·纳赛尔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想使赫鲁晓夫对阿里夫采取一种更加合乎情理的立场，说：“你们已经习惯同卡塞姆打交道，因此，你们自然感到不容易同他的接替人交往，也许，你们仍然认为他是卡塞姆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你不要忘记，人们曾惯于说，纳吉布是埃及的头号人物，我只是在他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在非洲，法拉哈特·阿巴斯同本·贝拉的情况也是如此。你们现在同我、同本·贝拉的关系都不错，那为什么不能对阿里夫这样做呢？”赫鲁晓夫说：“不行，不行，情况完全不一样。”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要对你们讲一个一九〇五年俄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当时，指挥俄国舰队的是一位大家都讨厌的海军上将，他颀颀无能，但是，他的助手为大家所爱戴，是个能干的海员，一位很好的人。尔后，传来消息说，海军上将和他助手乘的船被击沉了，舰上全体人员都已溺死。在海军中，因想到这位上将已死而普遍感到高兴。但是，遗憾的是，他的那

位助手也死了。接着，收到了第二封信，说该舰上的一部分人最后被救出来了，其中有那位司令，但是，肯定他的那位副手已经淹死。我要把当时水兵们所讲的话告诉你，他们说：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金子沉底，而干草漂浮。尔后，当赫鲁晓夫突然意识到这个故事的寓意，对在场的某些人来说，并不是赞颂时，他试图进行解释，说：“当然，这不是影射在座的任何人。”

然而，这不是轻松的一天。宾主围坐在一起大约六个小时。他们侃侃而谈，但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渔夫们在他们的小船上干等着根本没有来的顾客。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大家原路折回。翌日，我们这样做了。

三天之后，当我们回到了开罗，谈起赫鲁晓夫的访问时，阿卜杜勒·纳赛尔又想起阿里夫事件。他说：“这些人不懂得如何同俄国人打交道，我想就这个问题写本书，就象你买一辆新汽车时得到的使用指南一样。”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并表示了我的这种意见。为什么我们不着手行动呢？实际上，我们开了一次会，讨论了这个计划，但是，当时我们决定，最好是等到阿卜杜勒·纳赛尔集中精力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退休后埋头写这部回忆录是他的夙愿。

在阿卜杜勒·纳赛尔头脑中已经进行了十分明确的构思的这本指南与政治没有关系，不涉及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否应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或这种关系应达到什么程度。显然，他不能说这些，他关心的是策略或方式问题。

阿卜杜勒·纳赛尔考虑，先介绍一下我们应该预料到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同苏联人之间的关系要经历的几个阶段，然后撰写一份守则，它应该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们在他们的苏联同事面前如何举止行事的指针。